汉译西书之于日本江户兰学的借鉴意义

□ 徐克伟

摘　要：江户中后期，日本学界兴起了一场借助荷兰语吸收西方科技知识文化的学术运动，即兰学。不少兰学作品，特别是幕府主导的翻译事业《厚生新编》，数次言及明清两代的汉译西书。本文以该作品为中心，采用实证的研究方法，探讨汉译西书之于日本兰学的借鉴意义，以展现中日欧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

关键词：汉译西书　兰学　《厚生新编》　翻译研究　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K313.36　　**doi:** 10.19326/j.cnki.2095-9257.2021.01.018

引　言

关于汉译西书在日本的传播及其影响，海内外学界早有探讨，且成果丰硕。[①] 大体如中山茂（Nakayama Shigeru，1928—2014）所指出的那样，江户中后期的兰学——借助荷兰语翻译介绍西方近代科技知识的学术运动——勃兴之前，日本学人对西方知识的摄取主要是通过耶稣会士的汉文著述及其衍生作品实现的。[②] 不过，亦有学者对此提出批评，认为汉译西书阻碍了日本学者对西文原典的涉猎。[③] 涉猎原典更多受文献流通、外语水平等因素制约，实在难以开罪于汉译西书，但我们还是不禁要问：汉译西书在日本的广泛阅读，只是因为当时的学者无法直接阅读西语文献，还是有别的原因？如果说汉译西书曾是其获取西方信息的主要渠道，那么随着兰学的展开，江户学者接触并逐渐译介西语文献，是否就不再需要汉译西书所承载的相关知识？倘若需要，具体参考利用的是哪些内容？如果不再需要，究竟又发生了怎样的历史变化？诸如此类颇具学术价值的基础问题，很有必要予以深入探究。

如果将 1774 年问世的《解体新书》看作兰学成熟的起点，或不难理解其中对汉译西书相关作

① 受篇幅所限，简要例举几份最具代表性且于后文未直接引述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国方面，如方豪、吴永贵等氏对汉译西书之于日本的历史作用或相关文献传播情况的把握，方豪：《中国在日欧初期交通史上之地位》，《方豪六十自定集》（上），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9 年，第 123—146 页；吴永贵、褚继红：《近世汉译西书在日本的流传》，《津图学刊》1996 年第 3 期，第 123—131 页；日本方面的研究颇多且更为具体，集中在地理学、天文历算等领域，前者有荒川清秀（Arakawa Kiyohide）的梳理可供检阅（荒川清秀：《近代日中学术用语的形成与传播：以地理学用语为中心》，东京：白帝社，1997 年，第 23—38 页），后者可参阅小林氏的研究成果（小林龙彦 [Kobayashi Tatsuhiko] 著，董杰等译：《德川日本对汉译西洋历算书的受容》，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 年）；欧美学界的相关探讨如坂西志保（Shio Sakanishi，1896—1976）、唐纳德・基恩（Donald Keene，1922—2019）等对汉译西书在日遭禁、政令缓解的论文和专著：Shio Sakanishi, “Prohibition of Import of Certain Chinese Books and the Policy of the Edo Governmen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57. 3 (1937): 290—303; Donald Keene, *The Japanese Discovery of Europe, 1720—1830*.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156—172.

② 中山茂：《关于耶稣会士贡献的评价》，伊东俊太郎（Itō Shuntarō）、村上阳一郎（Murakami Yōichirō）编《讲座科学史 4：日本科学史的射程》，东京：培风社，1989 年，第 213 页。

③ G. B. Sansom, *The Western World and Japan: A Study in the Interaction of European and Asiatic Culture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1, pp. 203—204.

品的参考：[①]起始阶段，或可以简单归因为学术习惯所致。但是随着兰学的深入展开，乃至幕府组织翻译的百科全书《厚生新编》（1811—1845）仍有对汉译西书名著《职方外纪》的“引用参看”，研究者慨叹内容“丰富多彩”之余，也为我们留下了继续挖掘并深入探讨的空间。[②]

作为官方翻译事业的《厚生新编》，汇聚了当时最优秀的兰学家十余名，历时三十余载，完成译稿达百卷，可谓明治前日本西书翻译的集大成之作。[③]虽然该翻译事业最终未能完成，在当时亦未获出版，但相关知识确已通过抄本与主力译校者的作品流传开来。[④]本文以该作品为中心，调研汉译西书相关典籍的具体使用状况，以窥其在日本江户兰学展开之际具有的借鉴意义。

一、参考概况

在《厚生新编》译稿中，计有“龙脑”“椰子”等七项词条明确言及汉译西书相关内容。为方便论述，特制表 1 如下：

表 1 《厚生新编》所参引汉译西书相关知识简表

词　条	卷　次	译校者	参引作品
西洋绵纸抄造法	23	大槻玄泽（Ōstuki Gentaku，1757—1827）、宇田川玄真（Utagawa Genshin，1769—1834）译校	《职方外纪・欧罗巴总说》
龙脑	25	同上	《职方外纪・渤泥》
椰子	27	同上	《职方外纪・印弟亚》
元行	37	同上	《空际格致・元行》
猫	41	宇田川榕庵（Utagawa Yōan，1798—1846）译、宇田川玄真校	《职方外纪・利未亚总说》
吐绶鸡	43	同上	《坤舆图说・亚墨利加州白露国》
诸药蒸馏法	续稿 10	大槻玄泽、宇田川玄真译校	《泰西水法・药露》

注：译稿今藏于日本静冈县立中央图书馆葵文库（江户幕府藏书，该稿本网络链接https://multi.tosyokan.pref.shizuoka.jp/digital-library/detail?tilcod=0000000031-SZK0000088，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10月19日），经后人整理分别于1937年、1978年出版了活字本一册（70卷）、影印本五册（前四册计70卷，第五册为后发现的32卷，被编作续稿）。本表即据稿本、活字本、影印本制作而成，具体页码及出版信息详见后文具体论述部分。

据表 1 不难发现，共言及《职方外纪》等作品四部，相关知识点七处，涵盖地理、化学、生物学等方面，所涉作品均出自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之手，未涉及清末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等汉译作品。[⑤]就译校者而言，虽然仅有大槻玄泽、宇田川玄真、宇田川

① 杉本孜（Sugimoto Tsutomu）：《近代日中言语交涉史序说：以方以智〈物理小识〉为中心》，《国文学解释与鉴赏》1991 年第 56 卷第 1 号，第 186—204 页；陶惠宁：《论〈重订解体新书〉所引〈物理小识〉》，《日本医史学杂志》2001 年第 47 卷 3 号，第 508—509 页；陶惠宁：《〈重订解体新书〉所引中国书籍之研究：〈医学原始〉与〈物理小识〉》，《日本医史学会》2002 年第 48 号，第 155—174 页。

② 杉本孜：《江户时代西洋百科事典：〈厚生新编〉研究》，东京：雄山阁出版，1998 年，第 73 页。

③ 板泽武雄（Itazawa Takeo）：《厚生新编译述考》，《史学杂志》1932 年第 43 卷第 8 号，第 949 页。

④ 木村阳二郎（Kimura Yōjirō）：《生物学史论集》，东京：八坂书房，1987 年，第 141—142 页。

⑤ 1828 年，马礼逊所纂《华英字典》传入日本，很快便进入宇田川榕庵等译者的视野中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日本学界在这方面已有颇多探讨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近有国内学者邢鑫的梳理与探讨可供参考；邢鑫：《多识草木：日本近世博物学传统及其转化》，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哲学系，2017 年，第 130—134 页。另外，《厚生新编》中还参考了汉译西书影响下中国学者所撰著述，如《物理小识》（1664）等西学作品，即衍生品，亦可视为广义上的汉译西书，受篇幅所限，只得割爱，未纳入本次考察范围。

榕庵等三人，但是均系《厚生新编》翻译事业乃至兰学发展史各阶段的主导力量与核心人物。[①] 下文将按照所涉文献及其性质，具体考察相关知识的参考情况，以思考其作用或局限。

二、《职方外纪》与《坤舆图说》

在《厚生新编》中，被言及最多的汉译西书为地理学著作《职方外纪》(1623)，共四处。《职方外纪》系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在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及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1575—1620）著述基础上编译，杨廷筠（1562—1627）润色而成。

其中，第一处见于“西洋绵纸抄造法”的按语中。顾名思义，译文主要为造纸术相关内容，据荷兰语本词条“PAPIJER”译出。[②] 其中关于西方造纸问题，译者有如下按语：

> 西洋纸利诺云云，偶见于《职方外记》。原书之全文，“欧罗巴总论”有云：“有苎蔴之类，名利诺者，为布。绝细而坚，轻而滑，大胜棉布，敝则可捣为纸。极坚韧，今西洋纸率此物。”按“利诺”者，“linī”之音译字也。自此取丝作布，彼曰“linen”又“linen jute”即棉布也。西方以敝布作棉纸事，明季既有传译。[③]

因为译文内容论及西方造纸，所以译者引用了《职方外记（纪）·欧罗巴总论（说）》（卷二）以破布造纸的论述，[④] 并指出所谓“利诺”即“linī”之音译，明末已有译介。

第二处见于“龙脑”（CAMFER）：[⑤]

> 又明末清初汉人译书中亦曰“渤泥出片脑极佳”。又清人一译书举龙脑产地数名，以渤泥为第一。由此等考之，羯婆罗应为渤泥岛原名……与近世明人坤舆总界之诸译书中言之渤泥相同，唯其译字异也。[⑥]

龙脑，在传统本草学中名为“羯婆罗香”（Camphora）。为探明龙脑产地，先是引“明末清初汉人之译书亦曰‘渤泥出片脑极佳’”，即艾氏于卷一“渤泥”中所论：“渤泥岛在赤道下。出片脑极佳”；[⑦] 又引列举龙脑产地数种且以渤泥为首的“清人之一译书”。遗憾的是，这里所指具体何书，尚难以确定；“羯婆罗”［婆罗］即“渤泥”（Borneo）原名。至于文末所谓“明人坤舆总界之诸译书”，因未言明，难以判定都有哪些作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所指应为于明末绘制完成并传入日本的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坤舆万国全图》（1602）及此处业已确认的《职方外纪》等地理学作品中所载世界地图。

---

① 《江户时代西洋百科事典：〈厚生新编〉研究》，第 92—96 页。

② 日译所据荷兰语底本问世于 1778 年，译稿有 1937 年活字本和 1978 年影印本，Noel Chomel & De Chalmot, *Algemeen Huishoudelijk, Natuur, Zedekundig, en Konst Woordenboek*, Vol. 5. Leyden & Leeuwarden: Joh. Le Mair & De Chalmot, 1778, pp. 2580—2588；贞松修藏（Sadamatsu）编：《厚生新编》，静冈：厚生新编刊行会，1937 年，第 279—284 页；肖梅尔（Noel Chomel）著，马场贞由（Baba Sadayoshi）、大槻玄泽等译：《静冈县立中央图书馆所藏厚生新编》（第 2 册），东京：恒和出版，1978 年，第 109—126 页。

③ 原文为日语，笔者自译，以下皆然。原文作“西洋帋利諾云々こは職方外記にて偶々見たりと覺ゆ。原書の全文は歐羅巴總論云。有苧麻之類。名利諾者。為布。絶細而堅。軽而滑。大勝綿布。敝則可搗為帋。極堅韌。今西洋帋。率此物とあり、按に利諾は「リニー」の音譯字也。これより取りたる糸にて布を作りしを「リンネン」又「リンネグート」と彼にいふ卽ち棉布也。西方敝布をもて作れる棉の帋こと既に明季に傳訳あり。”《厚生新编》，第 281 页；《静冈县立中央图书馆所藏厚生新编》（第 2 册），第 116 页。

④ 艾儒略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67—68 页。

⑤ Chomel & Chalmot, *op.cit.,* Vol. 1, p. 265；《厚生新编》，第 319—324 页；《静冈县立中央图书馆所藏厚生新编》（第 2 册），第 250—264 页。

⑥ 原文作“されは明末清初漢人の譯書中にも渤泥出片腦極て佳なりといひ。又清人の一譯書に龍腦産地數名を擧るの中に溺泥を以て其第一とも見へたり。これらに由つて是を考れは羯婆羅は渤泥嶋呼ふ所の原名なるへく（中略）乃ち近世明人坤輿総界の諸譯書中にもいふ所の渤泥と同しかるへく、唯其譯字を異にするのみなり。”《厚生新编》，第 322 页；《静冈县立中央图书馆所藏厚生新编》（第 2 册），第 259 页。

⑦ 《职方外纪校释》，第 62 页。

后两处的引用则较为简短。其中，第三处见于“椰子”（COCOS-NOOT）。[①] 仅在译文中论及椰树造福印度民众时，引述卷一“印弟亚”部分关于椰树在印度的利用情况：“种一木而一室之利毕赖［之］焉［矣］”[②]。第四处见于“猫”（KATTEN），[③] 译者引卷三“利未亚总说”中“利［未］亚国百兽相合辄产奇怪”，以印证译文所言两头八足的猫崽。[④]

另一部地理学作品《坤舆图说》（1674），由明末清初在华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撰述，所论地理知识“大致与艾儒略《职方外纪》互相出入，而亦时有详略异同”[⑤]。该书相关内容的引述见于词条“吐绶鸡”（KALKOEN）。[⑥] 对于译文所论吐绶鸡不易饲养，因原产热带，雏鸡容易冻伤，译者言道：“榕按，《坤舆外记》云‘生子之后，不甚爱养，须人照管方得存活，是也’”。[⑦] 榕，即译者宇田川榕庵，所谓《坤舆外记》为南怀仁另一地理学作品，但从所引内容来看，应出自《坤舆图说》卷下“异物图”中“吐绶鸡”的文字说明“亚墨利加州白露国产吐绶鸡……方得存活”。[⑧] 或因两作品名称、内容相似，以致产生了混淆。这种混淆却也反映出宇田川榕庵对这两种作品均有所了解。

无论是艾儒略的《职方外纪》，还是南怀仁的《坤舆图说》《坤舆外记》很早便传入日本，并对当时的学界产生了极大影响。对此，学界早有考证，无需多言。[⑨] 但值得注意的是，译者的参考方式呈现一定的变化。虽然四则内容均系对译文内容的辨析，但前两条所言及的西方造纸术、龙脑产地辨析，均或多或少涉及传统知识，后两条则仅仅为佐证译文内容而只言片语地引用相关内容。

三、《空际格致》

对《空际格致》的参考见于译自“ELEMENTEN”之“元行”译文前的按语中：[⑩]

> 按汉土振古有五行之目，西域从古论立四元行……西洋欧罗巴地方古来亦同。尝入汉地名高一志之人格致书四元行论之“行之名义”曰：行者，纯体也，乃所分不成他品之物，惟能生成杂物之诸品也。所谓纯体者，何也？谓一性之体，无他行之杂也。盖天下万物，有纯杂之别。纯者，即土、水、气、火四行也。杂者有五品云云。自此逐条《行之数》《金木不得为元行》《行之序》《行之形》《行之厚》等极详密尽辨。本条载所定此四行，余渐渐举分数行诸说，读之先辨振古以来之四元行论。其细分之理义难得辨，本

① Chomel & Chalmot, *op.cit.*, Vol. 1, pp. 397—398；《厚生新编》，第 348—350 页；《静冈县立中央图书馆所藏厚生新编》（第 2 册），第 349—352 页。

② 《厚生新编》，第 349 页；《静冈县立中央图书馆所藏厚生新编》（第 2 册），第 352 页；《职方外纪校释》，第 40 页。

③ Chomel & Chalmot, *op.cit.*, Vol. 3, pp. 1455—1459；《厚生新编》，第 512—513 页；《静冈县立中央图书馆所藏厚生新编》（第 3 册），第 152—157 页。

④ 《厚生新编》，第 512 页；《静冈县立中央图书馆所藏厚生新编》（第 3 册），第 155 页；《职方外纪校释》，第 40 页。

⑤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坤舆图说二卷》，见南怀仁著，王云五主编《坤舆图说及其他一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年，第 1 页。

⑥ Chomel & Chalmot, *op.cit.*, Vol. 1, pp. 397—398；《厚生新编》，第 528— 530 页；《静冈县立中央图书馆所藏厚生新编》（第 3 册），第 226—234 页。

⑦ 原文作“榕按に坤輿外记に生子之後不甚愛養須人照管方得存活と云是なり。”《厚生新编》，第 529 页；《静冈县立中央图书馆所藏厚生新编》（第 3 册），第 229 页。

⑧ 《坤舆图说及其他一种》，第 198 页。

⑨ 鲇泽信太郎（Ayusawa Shintarō）：《论江户时代世界地理学史上的〈职方外纪〉》，《地球》1935 年第 24 卷第 2 号，第 117—134 页；鲇泽信太郎：《论南怀仁〈坤舆图说〉与〈坤舆外记〉：特别是在世界地理学史上》，《地球》1937 年第 27 卷第 6 号，第 426—433 页。

⑩ Chomel & Chalmot, *op.cit.*, Vol. 1, pp. 617—619；《厚生新编》，第 454—456 页；《静冈县立中央图书馆所藏厚生新编》（第 2 册），第 789—795 页。

说之始附高氏译言尔。[①]

明末，西方的四元素概念（土、水、气、火）随来华传教士流入中国，被译作“元行”。其中，以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一名王丰肃，Alfonso Vagnoni, 1566—1640）所著《空际格致》（1624—1638 年间某一时期）最为精详。“元行”的译名及其相关论述亦在《厚生新编》中得到了继承。从上述的引文不难看出，译者在简要叙述了中国的“五行”说（木、火、土、金、水）与印度的“四大”说（地、水、火、风）后，便详细引用了《空际格致》中的“元行”概念（卷上之“行之名义”），并历数该书后文内容，《行之数》《问金木为元行否》《行之序》《行之形》《行之厚》等章节目录。译者认为，高一志的论说极其详密，希望读者借此明确西方自古以来的四元素说，以便理解元素概念的发展变化。

元素说的近代化问题，可参阅相关学者的考察，[②]而《空际格致》在日本的传播，学界亦有探讨，无须赘言。[③]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译者这里的引用并非简单的原文照抄，而是既有对原文的引用，亦有对整体内容的归纳概括。

四、《泰西水法》

《泰西水法》（1612）是明末的西方水利学著作，由耶稣会士熊三拔口述、徐光启（1562—1633）笔录、席世臣（生卒年不详）校订，后收录在《天学初函》（1628 年刊行）以及《农政全书》（1638 年刊，第 19 卷）中。关于该书在日本的传播，学界已多有讨论，不复赘言。[④]而相关内容出现于“DISTILLATIE”译出的续稿卷十“诸药蒸馏法”。[⑤]与以上各处明显不同的是，按语不但首尾皆有，而且引文篇幅较长。

在译文前的按语中，译者介绍了传入日本的蒸馏法。我们据此了解到，蒸馏法在当时的日本俗称“蒸露罐法式”，即根据蒸馏时所使用的器皿命名；而关于这种器皿，《泰西水法》等译作“兜牟”或“蒸馏（馏）”，并引“药露”之定义“凡诸药草木果蓏谷菜部，具有水性者，皆用新鲜物料，依法蒸馏得水，名之为露”释说“此唯蒸馏具有水性诸药草木果瓜，得露水之法也。”[⑥]

玄泽、玄真发现，其所生活的时代距《泰西水法》问世已有 210 余年，蒸馏法于西方世界的成熟完善可想而知，故又大篇幅地全文抄引其卷四所论“以水治病其法有二：第一温泉，第二药露”之“第二药露”所论以及蒸馏器皿的图画“药露诸器图”。[⑦]对此，译者解释道：

是于明季传其法一端也。其传法可谓颇译得。但说消化、饮食、传变之理，译者未

① 原文作“按漢土振古五行の目あり。西域は従古論を四行に立つ。（中略）西洋歐邏巴地方古來亦同じ。嘗て漢地に入りし高一志と云ふ。人の格知書四元行論行之名義曰。行者純體也。乃所分不成他品之物惟能生成雜物之諸品也。所謂純體者何也。謂一性之體無他行之雜也。蓋天下萬物有純雜之別。純者卽土水氣火四行也。雜者有五品云云。自此逐條行之數。金木不得爲元行。行之序。行之形。行之厚。等極て詳密に辨じ盡せり。本條載する所はこの四行に定めたるの餘漸々數行に分ちたる諸説を擧て讀むもの先づ振古以來の四元行の論を辨へずしては其細分の理義は得辨へがたしと。本説のはじめに此高氏譯言を附すると爾り。”《厚生新编》，第 455 页；《静冈县立中央图书馆所藏厚生新编》（第 2 册），第 789 页。

② 吉野政治（Yoshino Masaharu）：《“元素”一词：从东洋自然哲学到西洋近代科学》，《同志社女子大学综合文化研究所纪要》2013 年第 30 卷，第 182—194 页。

③ 陈广宏著，伴俊典译：《关于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空际格致〉》，《中国文学研究》2012 年第 38 卷，第 1—23 页。

④ 鮎泽信太郎（Ayusawa Shintarō）：《熊三拔〈泰西水法〉及其传来日本》，东京教育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室编《东洋史学论集》（第 3 册），东京：不昧堂书店，1954 年，第 1—12 页；铃木武雄（Suzuki Takeo）：《锁国下基督教禁书〈泰西水法〉传来与流布》，《数理解析研究所讲究录》2012 年第 1787 卷，第 116—126 页。

⑤ Chomel & Chalmot, *op.cit.*, Vol. 1, pp. 495—516；《静冈县立中央图书馆所藏厚生新编》（第 5 册），第 257—281 页。从内容关联性上来看，续稿卷 10（诸药蒸馏法）、续稿卷 11（之二）即前 70 卷中的欠本第 31、32 卷，与第 33 卷（之三、四、五）均译自“DISTILLATIE”。

⑥《静冈县立中央图书馆所藏厚生新编》（第 5 册），第 258 页；熊三拔撰说，徐光启笔记，席世臣校正：《泰西水法·序》（卷 4），上海：扫叶山房（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1612 年，第 4b 页。

⑦《静冈县立中央图书馆所藏厚生新编》（第 5 册），第 258—262 页；《泰西水法》，卷 4，第 4b—7a 页；卷 6，第 10a 页。

能辨究实测之理。至于胃化传脾云云，化气归筋云云等论说，未脱却旧染。宜实理斟酌。我方医家之所传，乃荷兰医来航以降之传法，是亦诸法之一端绪也。人宜熟考本编以临事。汉人亦先我而所传记前文之件件所载，世人应先于此知其大要，玩索后文之诸说，得真术为要。故于此附记明人译说也。①

明末所译乃西方蒸馏法的一种，兰学家对熊三拔等人翻译之功给予了正面评价，同时就部分内容提出了批评，如关于饮食消化传变的理论，认为并没有根据实测进行探究，所论“胃化传脾”“化气归筋”等说法即沾染了旧的习气，缺乏科学依据。尽管如此，还是将汉译西书的内容放在这里，这是因为译者认为汉译西书更早掌握到了大体内容，应仔细与后文的译文对比研究，以掌握其中的精髓。

简而言之，译者认为《泰西水法》与这里的译文内容同样源于西方，从时间上看，前者更早，希望读者可以通过对照阅读，掌握更精确的学说，这也就是译者大篇幅引用的原因所在。

结　论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大致梳理了译者对汉译西书翻译资源的参考情况。不难发现，尽管汉译西书被江户幕府列为禁书，但并未完全阻断日本学者对该资源的参考使用。如果说在兰学成熟之前，大多数学者尚不能直接阅读西方文献，必须假借这些文献学习西方知识，但到了《厚生新编》时期，译者的荷兰语水平已达到可阅读西文的程度，在直接摄取西方文化的同时，他们依然参考利用汉译西书。对于这些作品，大槻玄泽、宇田川玄真等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积极参照对比，以深化认知水平。也就是说，作为日本西学一环的兰学并非西方文化的简单翻译，确有对明清之际汉译西书的参考与批判，后者对前者而言有其切实的借鉴意义。从这个角度而言，看似日欧文化交流的江户兰学实可谓中日欧三方的碰撞与融合。

不过，历时地看，大槻玄泽、宇田川玄真共同译校部分的参考内容较多，且不乏大段原文抄引；到了后继者宇田川榕庵那里，参引明显减少，且多做简单旁证。

另外，关于汉译西书这一资源，作为译者之一的大槻玄泽亦有明确论述：

挽近天文星历之诸术，取西洋所说之诸编而成者殊夥。闻是名，洋人于本地传译笔录，以所纂修云。亦是异于吾辈之直就彼邦横文，抗颜强译者也。皆自非笃学高才之名士所不能也。今吾辈以不敏无学，不娴汉文，换易彼异言横文，欲新为誊释，则不可敢当其任也。然僻其所好，自不固陋，勉焉从事于此而已。然则条条件件不免多难通者必也矣，请识者谅察正诸。②

尽管明清汉译西书颇多，但并非直译：或西人口授、汉人笔录，或汉人吸收西人的译介成果，可谓一针见血。当然今天看来，玄泽所谓“直就彼邦横文，抗颜强译”，其实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直译，包括《厚生新编》在内，荷兰语底本亦非原语，故兰学翻译多为转译，但是亲执译笔的兰学家则认为，较之于西人口译、汉人笔录的汉译西书，兰学翻译更进一步。当然，因为是“抗颜强译”，所以译者也意识到其中的艰辛，并保持着谦恭的态度。

日本西学之际对汉译西书的参考是在批判中展开中。耶稣会士的作品确曾为译介吸收西方知识之际发挥了一定的功用，确有其参考借鉴意义。随着兰学全面深入的展开，曾作为日本学人获得西方知识主要渠道的汉译西书才逐渐退居二线。

（徐克伟：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① 原文作“これ明季に於て、其法一端を傳へたるなり。其傳法はよく譯し得たりといふへし。但飲食消化傳變の理を説るものは、訳者未た實測の眞理を辨究せす。胃化傳脾云云、化氣歸筋云云等の論説に至りるハ舊染を脱却せざるのみ。宜く實理と斟酌すへし。我方醫家の傳ふる所ハ、和蘭醫人來航已来の傳法と覺ゆ。是亦諸法の一端緒なり。人よろしく本编を熟考して事に臨むへし。漢人も我に先立ち伝記する所右件々所載のことなれハ、人先こゝに其大要を知りて、本编左の諸説を玩索して、眞術を得ることを要とすへし。故に明人の譯説をこゝに附記せるなり。”《静冈县立中央图书馆所藏厚生新编》（第 5 册），第 262 页。

② 大槻玄泽：《重订解体新书》（第 12 卷），京都、大阪、江都：植村藤右卫门、鉛屋安右卫门、秋田屋太右卫门、须原屋市兵卫，1826 年，第 31ab 页。

permission to wear the sacrificial hat, and then analyzes the discussion of the sacrificial hat in Chinese literature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The sacrificial hat embodies the Catholic Church's accommodation to the Chinese society,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missionaries and Chinese Christians, and the communications between Rome and the Church in China. Furthermore, the non-Christian's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sacrificial hat indicates that the Christian ritual in China was not isolated from Chinese society but was influenced by a part of it.

Key words: the sacrificial hat, the hat of the Mass, ritual, accommoda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Western Books for the Japanese Rangaku in the Edo Period

Xu Kewei

Abstract: In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Edo, there arose an academic movement called Rangaku, or Dutch Studies in Japan to absorb Wester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and culture via Dutch works. During the late Tokugawa Period in Japan, some works of Rangaku especially in *Kōsei Shimpen*, or *New Compilation for the Public Welfare*, a project of translation advocated by the Shogunate, mainly are about the translation of Western books into Chinese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is paper takes this work as the center and adopts an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 to discus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ranslation of Western books into Chinese for Japanese's Dutch Studies, so as to show one side of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Japan and Europe.

Key words: Western books in Chinese, Rangaku, *Kōsei Shimpen*, translation studies, cultural exchanges

Chinese Recorder and Fengshui Research

Xue Weihua

Abstract: Fengshui has its unique cultural value in the collis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modern times. By going through the texts on Fengshui in *Chinese Recorder* (1867—1941), a church official periodical published in China for more than 70 year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ssays and monographs of the representative authors to explore Western research and attitudes on this subject to show a long period of textual research with change regarding sinological understanding.

Key words: Fengshui, *Chinese Recorder*, sinology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Natural History in Modern France: A Critical Study of Jean Pierre Armand David

Li Lei & Shen Hong

Abstract: Three field studies conducted by Jean Pierre Armand David (1826—1900), a missionary in China of the Congregation of the Mission,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atural science in modern France. However, due to the promotion of scientific materialism, the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 seldom mentions or avoids talking about the background of Armand David. This articles combines David's missionary background with his scientific explorations, sorts ou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his investigative activities in China and his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natural history, and explores the formation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natural history in modern France.